

成為老年父母的照顧者： 成年子女的孝道信念、代間多重時空框架 經驗整合能力及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

吳志文

葉光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本文探討華人重視的孝道信念是否能透過代間多重時空框架經驗整合（簡稱多框架整合）能力作用，進而提升成年子女對代間照顧者角色產生認同的中介運作歷程，並援引孝道雙元模型，檢證相互性與權威性兩面向孝道不同的影響機制。研究邀請年滿35歲且其父親或母親至少一人健在的成年人填寫調查問卷，分別蒐集到488筆父親版與518筆母親版有效問卷資料。結果顯示：相互性孝道對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正向效果，不論互動對象是父親或母親，都達顯著水準；但是權威性孝道的效果僅在對象為父親時達顯著水準；而且不論是對父親或母親對象，相互性孝道的效果都較權威性孝道更具優勢性。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對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影響，在父親與母親對象上都具正向顯著效果。相互性孝道可透過多框架整合能力，進而強化成年子女對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中介歷程，而且在互動對象為父親及母親時皆達顯著；至於權威性孝道透過多框架整合能力影響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中介歷程，僅在父親對象時達顯著水準。整體而言，孝道信念在華人社會具有鞏固家庭發揮照顧與支持高齡父母的功能，且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對代間照顧關係具有不同的影響效果。本文發現可供實務工作者參考，理解孝道信念如何促進華人子女認同其代間照顧者角色的歷程。

關鍵詞：代間多重時空框架經驗整合能力、代間照顧角色認同、相互性孝道、權威性孝道。

* 致謝詞：本論文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建議；研究經費獲科技部研究專題計畫經費補助，特此一併致謝。計畫編號: MOST 103-2410-H001-059-SS3

** 通訊作者：葉光輝，email: ykh01@gate.sinica.edu.tw。

DOI: 10.3966/172851862020090059001

壹、緒論

家庭具有提供照顧與支持的功能，對大多數人來說，從嬰孩到老年終其一生都可從家庭獲得安全的保障與心靈的慰藉。家庭具有不同的生命週期，雖然每個階段家庭都可發揮照顧與支持的功能，但是功能作用的形式與方向卻會隨階段的轉換而發生改變。兒少時期子女主要是在父母的呵護與庇蔭下成長茁壯，而當子女到了盛壯之年也是父母正逐步邁入衰弱老年之時，親子代間「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角色關係開始發生反轉，由子女反哺、保障父母老年的生活福祉，肩負起家庭中提供照顧與支持的角色職責。在重視孝道文化的華人社會，父母慈愛、子女孝敬的家庭倫理即鮮明地刻劃出華人親子代間互動的傳承模式（葉光輝，2005，2009a）。近年來台灣社會即便在高齡政策投入大量心力與經費，試圖健全正式的照顧體系，但家庭中親子代間的孝道倫理仍被認為是保障老年族群生活福祉至關重要的核心（葉光輝、曹惟純，2014）。雖然同住並不代表子女就能提供理想的照顧資源，但實徵資料顯示「與子女同住」仍是大多數台灣退休老年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居住安排方式（衛生福利部，2014），足以說明大多數老年人希望能由成年子女陪伴、照顧自己的老年生活。只是，目前卻缺乏針對華人親子代間「照顧者—被照顧者」角色反轉認同歷程的探討與實證研究。本研究主要目的，即是以華人家庭重視的孝道倫理作為主軸，延伸探討相互性與權威性兩種孝道信念，如何影響成年子女對於自己即將作為父母老年生活照顧者角色的認同程度，並且以代間多重時空框架經驗整合能力（葉光輝，2016）做為其中介影響的變項。

一、華人成年子女的代間照顧者角色

由成年子女保障老年父母的生活福祉並非是華人家庭特有的現象，許多西方研究也都關注代間關係品質對父母老年生活適應的影響（e.g., Chappell, 2016; Chappell & Funk, 2012）。但是在重視孝道倫理的華人家庭中，由成年子女作為老年父母的照顧者角色實有其特殊文化意涵。孝道被視為每個華人都應具備的美德，對華人成年子女來說，善待父母、令父母生活無虞都是具有責任性、約束力的角色義務，甚至是用來檢視個人品德良窳與否的重要判準（黃光國，2009；Smith & Hung, 2012）。費孝通（2006）在比較東、西方的家庭文化型態後指出：歐美社會的家庭生命週期是一種接力模式，主要關注由成年父母照顧撫育年幼子女所組成的家庭型態，當個體步入老年世代後則會從家庭體系中逐漸退場，而由成熟的新成年父母接替照顧撫育下一世代的

責任。相對地，華人社會的家庭生命週期是以一種反饋模式在世代間傳承，中間世代的成年子女就如同連結上、下世代的「鍊 (chain)」一樣，在照顧撫育下一世代的同時，仍需要贍養侍奉上一世代的高齡父母，以保障他們老年生活福祉；這種模式可確保華人個體，不論是在兒少、還是老年生命階段，都能夠受到來自家庭的照顧與支持。

在本研究中，代間照顧者角色指的是由成年子女肩負照顧、保障老年父母生活福祉的照顧者角色，而所謂「老年父母」並不侷限在陷入失能階段的父母。過往「家庭照顧者」多是以悲苦、愧疚、精神耗竭，甚至暴力失控的負面形象出現在相關研究裡（例如：林青蓉、王碧華、楊翠雲、黃君瑜，2013；黃志忠，2013；蔡佳容、蔡榮順、李佩怡，2016），這主要是因為過往研究多半聚焦在因病無法自理生活的高齡長者身上，卻忽略許多仍保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健康與亞健康老人。這些老人同樣需要家庭充分發揮照顧與支持的功能，並且期望能夠在符合個體化與自主需求的前提下，由成年子女提供關懷與陪伴等照顧資源（例如：吳志文、葉光輝，2020；林子鏞、喬芷，2013；陸洛、陳欣宏，2002）。對成年子女來說，若能夠即早覺察並接納自己身為代間照顧者的角色義務，關心並滿足父母在老年生活中的各項需求，即可維持老年父母的身心健康，令其享受有品質與尊嚴的晚年生活。目前的實徵研究已指出：良好社會關係能為老年人的健康福祉帶來正向效益（Cohen & Janicki-Deverts, 2009），尤其在華人家庭中，代間關係品質對老年父母的幸福感與身心健康都具重要的影響力（e.g., LaFave, 2016; Lu, Lou, Zuo, & Chi, 2016; Peng, Kwok, Law, Yip, & Cheng, 2019）。

參考過去學者對於代間照顧關係的界定，本研究強調「代間照顧者角色」的內涵不該僅侷限在財務與勞務的提供，而更加重視心理與情感上的積極關懷。利翠珊與張妤玥（2010）以34位成年受訪者的訪談資料進行分析發現：華人代間關係中「照顧」一詞的使用相當模糊，若是以金錢或實質物資的提供來看，成年子女仍舊會接受來自老年父母許多的照顧，但如果照顧是指提供撫慰、關懷以及陪伴，便可發現老年父母對於由成年子女照顧自己老年生活仍有著高度的期待。Lin 與 Yi（2011）分析了1,078筆中國成年子女與794筆台灣成年子女的調查資料，結果指出：相較於提供金錢與勞務等資源，在重視孝道倫理的華人家庭中，成年子女最常提供的代間支持資源仍是情感性的關懷與陪伴。林子鏞與喬芷（2013）以台灣老年人為研究對象，在分析了2,087筆男性與1,538筆女性的資料後也指出：成年子女對老年父母在情感上付出關懷與陪伴的照顧行為，相較於提供金錢或勞務等照顧行為，更能夠緩減父母老年生活中

對於經濟的不安全感受。

葉光輝（2016）曾以孝道倫理的核心價值詮釋華人家庭中親子代間的照顧關係，主張代間照顧關係不應侷限於滿足父母在身體護理或家事勞動等方面的需求，而應該更廣泛地涵蓋父母因邁入老年生活所衍生的各種需求，並且援引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Carstensen, 1992; Carstensen, Fung, & Charles, 2003）觀點，說明由於個體在老年階段特別重視與親友家人維繫正向的情感連結，因此成年子女對老年父母提供財務或勞務等資源僅是外顯易見的表層行為，孝道深層的真意仍是在強化親子代間緊密相依的情感連結。就如同論語中孔子回答子游詢問孝的表現時說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不論成年子女在代間照顧關係中提供何種形式的資源，其真正要彰顯的是在精神、情感上讓老年父母體會到自己仍是「對家庭有著貢獻之重要家人」的正面意象；如果只是提供金錢與物資，卻缺少對於父母的敬愛之情，反而可能令老年父母自覺被矮化成「對家庭不再具備生產價值、並造成負擔累贅之依賴人口」的負面意象。

為了能有效地評估華人成年子女這種基於孝道倫理而對代間照顧者角色的認同程度，葉光輝（2016）編製了一套標準化測量工具，並且強調該測量工具可用來評估覺察、正向解讀，以及接納等反映成年子女對代間照顧者角色產生認同的歷程。覺察指的是成年子女能夠意識到自己已是該肩負起代間照顧者角色的生命階段，會特別留心父母在老年階段中身心健康狀態的改變；正向解讀指的是成年子女能夠以具有功能適應性的認知想法詮釋代間照顧者的角色職責，尤其關注自己作為父母子女、家庭成員一分子的意義；接納則是指成年子女能夠將代間照顧者角色整合融入自己的現實生活，坦然地面對父母日益衰老退化對彼此關係帶來的改變，並且適切地調整自己的生活而不會感到為難或抗拒。這三個歷程之間並不存在著絕對的先後順序，而是會透過來回反覆調整的動態歷程，共同決定華人成年子女對於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程度。葉氏經以成年子女與老年父親、母親代間照顧關係的實徵資料（依序543筆、588筆）進行分析後，結果指出：不論互動的對象是父親或母親，該量表測得的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程度都與成年子女自覺代間關係情感融通的程度具有顯著的正向關聯。

二、孝道倫理與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

孝道倫理作為華人家庭極具文化特色的價值觀（葉光輝，2009a），不僅是台灣社會具有高度共識的核心價值（黃曬莉、朱瑞玲，2012），向來也是學者探討台灣老年人生活品質議題時聚焦的關鍵要素（例如：利翠珊、張好玥，2010；陳佳雯、張好

玥、高旭繁、陸洛，2013；魯慧中、鄭保志，2012）。回顧心理學對華人孝道倫理的研究軌跡，早先楊國樞（1985）剖析華人的重要古籍經典，歸納整理出15項孝道的主要內涵，其中包含敬愛雙親、使親無憂、隨侍在側，以及奉養雙親等項目，顯示子女應愛護照顧父母，尤其在父母邁入老年時協助父母分憂解勞。楊國樞、葉光輝、黃囁莉（1989）再以這15項主要內涵為基礎發展出一套標準化的測量工具，並經由大樣本施測以及探索性因素分析與內容分析後，將華人對於孝道倫理的信念區分為尊親懇親、抑己順親、奉養祭念，以及護親榮親等四個面向。又經由葉光輝（1997）進行二階層的驗證性因素分析（second-orde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後，確認這四個面向可聚斂為兩個更高層次的孝道運作原則，隨後建構出華人孝道的雙元模型（Yeh, 2003; Yeh & Bedford, 2003）。該模型梳理出相互性與權威性（reciprocal and 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這兩種屬性與功能不同的孝道心理運作向度，它除有效地解決了早期研究結果指出華人孝道觀念時而具有適應性功能（e.g., Kim, Kim, & Hurh, 1991）、時而具有破壞性影響（e.g., Ho, 1994, 1996）的矛盾爭議，更重新編製一套標準化測量工具，供後續研究者探討孝道觀念對華人子女身心發展（e.g., Chen, 2014; Jen, Chen, & Wu, 2019; Yeh, 2006, 2014）、代間互動（例如：吳志文、葉光輝，2020；林茜雯、葉光輝，2018；葉光輝，2009b）、人際關係（e.g., Chen & Wu, 2017; Chen, Yan, & Chen, 2018; Leung, Wong, Wong, & McBride-Chang, 2010）、學業成就（e.g., Chen & Ho, 2012; Chen & Wong, 2013），以及家庭生活適應（e.g., Chen, Wu, & Yeh, 2016; Liu, Li, Yeh, & Huang, 2011; Yeh & Bedford, 2004; Yeh, Tsao, & Chen, 2010; Yu et al., 2016;）等各項的影響效果。

根據華人孝道雙元模型（葉光輝，2009a），相互性孝道的運作基礎是父母與子女之間自然情感的互惠原則，對應於人際互動的水平軸，強調的是儒家思想中的「報」與「親親」原則；它指出子女體會自己因為有父母的關心、撫育與照顧，才從缺乏生存能力的嬰孩長大成人，這份恩澤自然銘記在心，並且基於與父母間長久以來累積的真摯情感，自然地會想要善待父母、希望能夠令父母感到順心愉快。相對地，權威性孝道的運作基礎則是奠基於華人家庭角色間的尊卑階序結構，對應於人際互動的垂直軸，強調的是儒家倫理中的「尊尊」原則；它指出由於父母相較於子女具有較高的階序地位，因此子女應當追隨、順從父母，並藉此互動規範來穩固家庭的秩序、維繫家庭各項功能的適當運作，因而作為子女必須盡其所能達成父母的要求，必要時甚至犧牲自己的權益來滿足父母的期待。

過往的實徵資料指出，持有較高的相互性孝道往往與華人子女的正向適應表現密切關聯，例如較高的生活滿意度與良好的親子互動品質（e.g., Chen, 2014; Chen et al., 2016; Jen et al., 2019）；而持有較高的權威性孝道雖然大多與負向的適應表現有關，像是較低的自我價值，還有憂鬱、焦慮、攻擊等傾向（e.g., Leung et al., 2010; Yeh, 2003, 2006），但近期也有研究指出，強調角色責任的權威性孝道具有提升家庭凝聚力（Chen et al., 2016）以及促進親子相互信任、了解等互動表現的正向影響效果（Yeh, 2014）。

在探討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代間互動關係研究中，同樣發現相互性孝道相對於權威性孝道具有較優勢的正向作用效果。葉光輝（2009b）以1,463筆台灣成年參與者的資料，針對成年子女提供父母資源的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子女相互性孝道與提供父母金錢、家務，以及情感等表現都具有顯著的正向關聯，而權威性孝道僅與提供家務的表現有顯著的正向關聯。吳志文與葉光輝（2020）蒐集了100位成年子女與158位老年父母的代間對偶資料，經由階層線性模型分析後發現：成年子女對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信念的認同度，對老年父母知覺的代間依附關係品質及正向生活適應都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果，並且指出相互性孝道的影響效果相對較為顯著。鄭欸（2004）以1,100筆台灣年輕成年子女資料，透過典型相關分析發現：年輕成年子女未來願意照顧父母老年生活的態度與相互性、權威性孝道都有顯著的正向關聯，而且同樣是與相互性孝道的關聯性較為明顯。Yu等人（2016）則以401位來自中國且老年父母罹患失智症的華人成年子女為研究對象，分析結果指出：相互性孝道與較低的照顧者負荷（caregiver burden）和較高的照顧者獲益（caregiver gain；例如：感到自己是有用的、對自己的生活更加滿意）都具有顯著的關聯。

之前也有研究以孝道雙元模型作為理論基礎，探討老年父母對成年子女的孝道期待，結果再次指出：相較權威性孝道，老年父母更加看重成年子女基於相互性孝道信念而做出的代間互動表現。Liu等人（2011）經由分析49戶華人三代同堂家庭的資料，發現成年父母比較希望年輕子女能依循權威性孝道的運作原則與自己互動，但是老年父母卻相對比較期望成年子女與自己互動時能夠基於相互性孝道的運作原則，展現親子代間自然真摯的親密情感來互動。呂宜峰（2016）在分析100位台灣老年父母提供的資料後同樣發現：比起權威性孝道，老年父母較在意其成年子女能否實踐相互性的孝道倫理。這些發現皆呼應社會情緒選擇理論（Carstensen, 1992; Carstensen et al., 2003）的主張，強調個體在老年的生命階段會更加重視自己與親友家人之間的正向情感交流。

為了確立雙元孝道與華人成年子女對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關聯性，近期林茜雯與葉光輝（2018）分別以老年父親、母親為互動對象的成年子女資料（依序為237筆、266筆），透過多元迴歸分析發現：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對於成年子女認同代間照顧者角色程度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果。這項發現符合過往學者主張孝道倫理在華人家庭中具有保障父母老年生活福祉的適應性功能，可促進子女在成年後反轉成為保障父母老年生活福祉的代間照顧者角色（楊國樞，1985；葉光輝，2009a，2016；葉光輝、曹維純，2014）。本研究的目的即是進一步以代間多重時空框架經驗整合能力作為中介變項，探討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信念在促進成年子女對代間照顧者角色產生認同的影響歷程與效果。

三、代間多框架經驗整合能力

框架（frame）是個體辨識、界定、理解特定事物的認知結構（Goffman, 1974），個體並藉此認知結構快速地因應與此相關的事物。而代間框架是指成年子女辨識、界定、理解自己與父母之間關係的認知結構，由親子雙方過往至今許多不同時空場景與角色職責的互動經驗所累積建構而成。過往已有實徵研究指出，成年子女對於代間關係抱持的框架，與代間照顧關係之間有正向的關聯。卓馨怡與利翠珊（2008）經由400筆成年參與者資料進行相關分析，結果指出：參與者對代間關係所抱持的正面評價，與參與者自覺身為華人子女應照顧父母老年生活的孝親責任感有顯著的正向關聯。謝美娥（2002）深度訪問家中有失能老人的8位成年子女與1位成年子女之配偶，分析結果指出：子代看待自己與家中失能親代長輩之間親情連結的代間框架，是影響其對長輩照顧安排之決策的重要關鍵。利翠珊與張妤玥（2010）透過分析34位成年受訪者資料，發現：華人子女成年後對於早期親子互動品質的詮釋，顯著地影響其與老年父母之間的照顧關係。

代間多重時空框架經驗整合（以下簡稱多框架整合）能力是代間框架概念的深化，根據葉光輝（2016）以及高子淳、葉光輝與何文澤（2019）指出，華人子女在邁入成年並為人父母的生命階段後，由於經歷了與父母早期在自己兒時所肩負的共同角色職責與適應挑戰（例如工作職場與經濟的壓力、家庭內外多重身分間的衝突等），所以能夠用更成熟且感同身受的嶄新認知觀點，重新理解自己與父母在多個時空場景下的生命經驗，豐富且整合地看待彼此之間的關係角色。個體能否有效地達成這個整合經驗的歷程，則決定於其「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的高低。對一般人而言，此能力的提升主要是透過個人對重大生命經驗轉變或情緒事件內容的體悟所帶來的「覺察、

反思、重新解讀（過往既有經驗的意義）」歷程而逐漸提升；但它也可以透過精心設計的學習方案的介入過程來加速其「覺察、反思、重新解讀」的歷程而提升其體悟。葉光輝（2016）主張，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尤其會展現在「體會父母過往為家庭付出的辛勞」、「反思自己過往不成熟的互動表現」，以及「用功能性思維重新詮釋過往親子互動困境對目前代間互動可能帶來的影響」等三個歷程上。高子淳等人（2019）透過兩個實徵研究，驗證了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具有促進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代間關係融通的正向效果：其研究一透過問卷調查法，分析了35歲以上成年子女評估自己與父親、母親之間互動的調查資料（依序270筆與284筆），結果發現：不論互動對象為父親或母親，成年子女具有較高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者，其自覺代間關係較和諧融通、對父母有較多的感激之情，以及當與父母發生衝突時也會有較多的忍讓行為；其研究二則透過歷時四週的書寫學習方案，引導成年參與者對於代間的多元角色進行觀點替取，提供重新審視代間關係並賦予具功能性意義的機會，藉此增進其對代間框架經驗的整合能力。經比較實驗組（26位參與者）與對照組（16位參與者）的資料發現，在前測階段兩組的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無顯著差異，但是有參與書寫學習方案的實驗組其後測分數相較於前測分數獲得顯著提升，而對照組的後測分數並未顯著提升，而且還發現實驗組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的前後測差異分數，與對父母感激之情、親子關係融通程度，以及在衝突下對父母的忍讓行為等三項指標的前後測差異分數也都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這些結果顯示：書寫學習訓練不僅能促進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還可以有效提升成年子女對代間關係互動品質的正向感受與表現。

四、孝道信念、多框架整合能力與照顧角色認同

本研究援引社會認知取向性格理論（social-cognitive theories of personality）觀點，強調個體內在性格系統中有許多涉及認知與情感的性格成分，這些性格成分會透過一系列相互連結的運作歷程，影響個體如何對外在世界做出主動的詮釋與回應（e.g., Cervone, 2004; Mischel & Shoda, 1995, 2008）。華人子女由於長期浸淫在重視孝道倫理的環境中，其內在性格系統中會型塑出許多與「孝道」相關的性格成分，這些成分廣泛涉及目標、信念、預期、情感等心理層面，並構成一系列具特定導向的心理運作原則；當援引孝道雙元模型的主張觀點（葉光輝，2009a），它可以區分為基於親子之間真摯情感的相互性孝道運作原則，以及講究角色責任與階序的權威性孝道運作原則。這兩種孝道信念會透過不同的運作機制促進子女善待、遵從父母的期望與需求，特別是當父母日益年老，作為子女更會肩負起保障父母老年生活福祉的照顧者角

色。然而由於成長背景與實際親子互動經驗的差異，個體之間重視並使用這兩種孝道運作原則的強度各有高低。愈重視、認同孝道倫理的華人子女，其與父母互動時愈會依循這些孝道運作原則，用來辨識、界定、理解親子代間關係的本質與互動的經驗。而持有較高的雙元孝道信念的個體，尤其是在自己成年以後，更會受到這些價值信念的驅使，而較認同自己應當擔負起保障父母老年生活福祉的照顧者角色職責，因而對年老父母具有較高的角色認同傾向（假設1）。另外，根據既往許多驗證孝道雙元理論的實徵證據顯示，相互性孝道相對於權威性孝道具有較優勢的正向作用效果，因此本研究也同樣推論訴求代間真摯情感交流的相互性孝道信念，相對於強調代間角色責任與階序結構的權威性孝道信念，對影響成年子女照顧年老父母的角色認同傾向，會有更明顯的正向作用效果（假設2）。

前面提及啟動個體「覺察、反思、重新解讀」過往既有經驗意義歷程，進而提升其「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的重大生命經驗轉變或情緒事件內容，它們可以是人生命週期中自然發展階段衍生的新事件（例如結婚、生子、或因父母老化需要自己肩負起照顧責任），也可以是不預期的重大生命事件或情緒事件（例如父母突然生重病）所帶來的促發；然而不論是自然發展衍生的或是不預期的重大生活事件，對個體而言，只要涉及到生活習慣的改變都可以看成是一項壓力事件。壓力事件會影響個體在其性格運作系統中提取與該事件相關的信念，進而主動地對該壓力事件產生認知評估與行為反應（Burr, 1982; McCubbin & Patterson, 1982）。本研究主張，成年子女在面對父母進入老年階段後，逐漸意識到自己與父母之間的「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關係需要反轉，由於這項造成改變的壓力事件涉及華人家庭文化的孝道價值觀，因此容易受到個體內在性格運作系統中孝道信念的影響與促發，並提取其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來面對及因應（高子淳等人，2019）。

因此，在成年子女之孝道信念、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及其對照顧老年父母的角色認同傾向三者間的關係上，由於個體受到雙元孝道信念的影響，華人子女進入成年階段後會因為自己也累積了許多與父母相似的生命經驗（例如結婚、工作、生子、為人父母、教養子女等等），所以在面對父母老化需要子女支持及照顧時，更能夠「覺察反思」並「正向解讀」這些與年老父母互動時所遭遇的各式經驗轉變，因而較容易將過往至今不同時空場景下的親子互動經驗相互交融與整合；而且其中愈重視孝道中真摯情感（愛）與尊卑階序（敬）的親子互動原則（即相互性孝道信念）者，愈能夠透過體悟父母過往為撫養照顧自己成長的辛勞、反思自己過去對父母總總行為是否恰當、而更能夠體諒現今老年父母的某些作為，接納老年父母某些作得不夠好的地方，

進而促發其對親子互動情感與關係形成功能性解讀等整合歷程，而增進其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假設3）。由於過往父母都是擔任家庭照顧者的角色，也會與自己現在作為自己核心家庭照顧者的角色多有重疊，因此成年子女會藉由自己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的提升，而對父母即將反轉成為被照顧者角色進行正向解讀，以及對自己即將反轉成為照顧者角色予以接納，並能夠對代間照顧關係角色的反轉開展出新的體悟，因而更加肯定、認同自己身為子女應當善盡保障父母老年生活福祉的照顧者角色（假設4）。當彙整假設3及假設4，本文進一步推論：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會透過對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中介的促進作用，進而提升成年子女對代間照顧者角色的認同傾向，即此項中介歷程的正向間接效果應達顯著水準（假設5）。

五、研究假設

綜合以上的文獻探討與分析，本研究共提出以下5項假設：首先，相互性孝道與權威性孝道對華人成年子女的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傾向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假設1）；其中，訴求代間真摯情感交流的相互性孝道，相對於強調代間角色責任與階序結構的權威性孝道，對成年子女的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傾向，會有更為明顯的正向作用效果（假設2）；其次，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對成年子女的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的發展會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3）；第三，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高者對成年子女的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傾向會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4）；以及最後，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能夠透過對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的促進作用，進而提升成年子女對代間照顧者角色的認同傾向產生顯著的影響效果，且此項中介歷程的正向間接效果達顯著水準（假設5）。

雖然傳統華人家庭主要是由男性子嗣擔任父母老年生活的照顧者（勞悅強，2004），但當代既有的研究不斷指出，台灣老年人對於關懷與陪伴的情感需求大多會寄望在成年的女兒身上（利翠珊，2002；利翠珊、張好玥，2010），而在華人家庭中父親與母親分別扮演著權威性與情感性的親職角色（Chao & Tseng, 2002; Chuang & Su, 2009），由於子代與親代性別的差異可能影響前述的各項假設結果，因此，本研究將依據四種親子對偶關係分別進行各項假設的檢驗，並且參考過往研究發現（利翠珊、張好玥，2010；林如萍、黃秋華，2017；卓馨怡、利翠珊，2008；葉光輝，2005，2009b），在控制以下各項人口學變項下探討其對分析結果可能造成的影響：子代與親代的年齡，還有子代的出生序、手足數、婚姻狀態、兒女數、是否與父母同住以及親代的健康狀態等。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與施測流程

邀請年滿35歲的成年人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父親年滿60歲且健在的參與者可填寫父親版問卷，母親年滿60歲且健在的參與者可填寫母親版問卷。由受過施測訓練的主試者前往大台北地區的公家機關單位，邀請等候辦理業務的民眾協助填寫問卷，在說明本研究的調查目的、確認受邀者符合資格，並且取得知情同意後，即邀請參與者當場填寫父親版或母親版的調查問卷。問卷內容包含了雙元孝道信念量表、代間多重時空框架經驗整合力量表、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量表，以及其他非本研究探究變項的測驗量表；父親與母親版本的問卷各自需要花費15至20分鐘的時間填寫。所有參與者都被事先告知可以隨時中止填寫調查問卷，在確實填寫完畢並且經由主試者確認沒有漏答題項後，每完成一個版本問卷即可以獲得新台幣50元等值的便利超商商品卡作為酬謝。

本研究共蒐集到724位參與者的有效資料，其中父親版計有488筆（女性324位；平均年齡43.03歲、標準差6.48歲；父親平均年齡73.15歲、標準差8.36歲）、母親版則有518筆（女性332位；平均年齡45.76歲、標準差7.95歲；母親平均年齡72.25歲、標準差8.99歲），兩個版本均填寫的資料計有282筆。參與者詳細背景資料請參閱表一。

二、測量工具

（一）華人雙元孝道信念

本研究使用Yeh與Bedford（2003）發展的孝道信念量表（Filial Piety Scale, FPS），評估參與者對於自己身為子女應如何與父親、母親互動的信念。由於欲探討不同親子對偶關係的影響，因此特別將原題項中的「爸媽」在父親版與母親版量表中依序更改為「爸爸」、「媽媽」。兩個版本都包含了測量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信念的題目各八題。其中，相互性孝道分量表測量參與者認同自己身為子女感念父母養育之恩或情感上關心父母的程度（例題：多與爸爸／媽媽交談，以了解爸爸／媽媽的想法和感受；對爸爸／媽媽的養育之恩心存感激），權威性孝道分量表測量參與者認同自己身為子女應盡己所能地服從父母期望的程度（例題：當自己與爸爸／媽媽意見不合時，要順從爸爸／媽媽的意見；放棄個人的志向，達成爸爸／媽媽的心願）。該量表採Likert六點量尺，從「非常不認同」至「非常認同」依序計為1至6分。此量表過去

以成年人為參與者的實徵研究中已顯現良好的信、效度（例如：吳志文、葉光輝，2020），在本研究中父親版兩個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分別為 .90與 .84；母親版則依序為 .89與 .83。

表一 父親版與母親版參與者背景資料摘要表

背景變項	父親版 資料	母親版 資料	背景變項	父親版 資料	母親版 資料
性別			子女數		
男性	164	186	沒有子女	142	129
女性	324	332	一位子女	102	118
年齡			兩位子女	193	210
35歲至39歲	185	137	三位子女以上	51	61
40歲至44歲	123	118	父母年齡		
45歲至49歲	82	102	60歲至64歲	64	110
50歲至54歲	62	86	65歲至69歲	137	125
55歲以上	36	75	70歲至74歲	85	89
出生序			75歲至79歲	80	74
獨生子女	11	10	80歲至84歲	64	66
長子女	176	172	85歲以上	58	54
中間子女	145	171	與父母聯絡頻率		
么子女	156	165	同住，每天見面	112	125
手足數			沒同住，每天聯絡	73	96
沒有	11	10	每月至少四次	52	56
一個	124	101	每月至少兩次	83	96
兩個	184	164	每月至少一次	87	86
三個	94	126	每月不到一次	81	59
四個或以上	75	117	評估父母健康狀態		
婚姻狀態			相當好	87	92
未婚	102	94	還不錯	271	291
已婚	359	376	有點不理想	96	112
喪偶、離婚或其他	27	48	相當不理想	34	23

註：父親版有效資料 $N = 488$ ；母親版有效資料 $N = 518$ 。

(二) 代間多重時空框架經驗整合能力

本研究使用葉光輝（2016）發展編製的多框架整合能力量表，測量成年子女能否整合自己與父母間在不同時間、不同代間角色之間的多重互動情境框架，進而對於過往至今的代間關係產生功能性的詮釋與體悟。量表內容涉及三個面向分別為覺察父母辛勞（例題：我能體會爸爸／媽媽作為家長，要照顧好整個家庭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能感受到爸爸媽媽過去為了家庭做了許多犧牲）、自我反思過往不成熟互動表現（例題：我能檢討自己過去和爸爸／媽媽互動時曾有的不成熟表現；我能反省自己過去應該更體諒爸爸／媽媽也有自己的情緒），以及功能性解讀過去衝突（例題：我認為過去與爸爸媽媽的衝突，有助於我們更了解彼此的想法；對於過去與爸爸媽媽之間的衝突，我能夠理解他／她其實是為了我好），每個面向各有四個題項，共計有12個題項。該量表採用Likert五點量尺，從「不符合」至「完全符合」依序計為0至4分。在葉光輝（2016）及高子淳等人（2019）研究中皆以成年子女為研究對象，並顯示父親版與母親版量表均有可接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 係數介於 .94與 .95之間），且如所預測的：成年子女之多框架整合能力越高者，可正向預測其對高齡父母的感激之情、衝突下的忍讓行為及其與高齡父母的關係融通程度。本研究雙親版本量表的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 .93與 .94。

(三) 代間照顧角色認同

本研究採用葉光輝（2016）發展編製的照顧角色反轉傾向量表，評估成年參與者在面對父母邁入老年生命階段時，反轉過往與父母之間的代間角色，也就是從早期生命經驗中接受父母撫育的被照顧者角色，轉變成為支持父母老年生活的照顧者角色，即是對於自己作為父母老年生活之照顧者角色的認同傾向。量表包含10個題項，分別用來測量代間照顧角色反轉歷程中的覺察、正向解讀，以及接納（例題依序：我常在生活中主動考慮到爸爸／媽媽的需求；陪伴上了年紀的爸爸／媽媽，讓我對家人的意義有更多的體會；我能坦然面對爸爸／媽媽年老後的各種變化而不覺得失落、抗拒）。此量表採用Likert五點量尺，從「不符合」至「完全符合」依序計為0至4分。在葉光輝（2016）及林茜雯與葉光輝（2018）研究中，皆以成年子女為研究對象，並顯示父親版與母親版量表均有可接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本研究雙親版本量表的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 .95與 .94。

三、分析策略

資料先以SPSS軟體進行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兩兩變項間相關係數等統計分析，接著再使用Mplus軟體，以最大似估計法進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SEM），並有以下五項處置：首先，為了簡化模型，參考Little等人（Little, Cunningham, Shahar, & Widaman, 2002）的建議使用項目與構念間平衡的合併策略（item-to-construct balance parceling strategy），將相互性孝道信念、權威性孝道信念、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以及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等潛在構念對應的測量項目，依循著令因素負荷量盡量接近的原則，各自合併成三個觀察指標。其次，將多項參與者的背景資料納入分析模型做為控制變項，包含了子代與親代年齡，以及子代的出生序、手足數、婚姻狀態、兒女數、是否與父母同住，還有對父母健康狀況的主觀評估。第三，在評估模型的整體表現時，採用多種適配度指標並參考學者建議的可接受標準：卡方自由度比值應小於3（Kline, 2016）；CFI、TLI等係數應大於.90（Bentler, 1990）；SRMR係數與RMSEA係數應小於.060（Byrne, 2010; Hu & Bentler, 1999）。第四，事先依據參與者性別為男性與女性，分別針對父親版與母親版資料各自進行多群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並且以各路徑係數進行參與者性別的卡方差異檢定，結果發現所有的差異比較均未達顯著水準，代表著子女的性別並不會影響本研究中各潛在變項間的路徑關係，因此後續僅呈現父親版資料與母親版資料兩種模型的分析結果，並在分析時將子女性別一併納入作為控制變項（男性 = 1；女性 = 0）。最後，透過Mplus軟體的語法，本研究以路徑係數乘積取向（product of coefficients approach）與自助法取向（bootstrapping）等方式，估算從雙元孝道信念到照顧者角色認同，透過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作為中介變項之間接效果的顯著性。最後均以自助法取向作為確認檢驗效果顯著性的根據。

參、研究結果

一、描述統計與相關

表二列出了主要變項的描述統計以及變項兩兩間的相關係數，結果顯示：所有主要變項之間皆具有達顯著水準的正相關。由於父親版與母親版僅有部分參與者資料是交集的，因此無法採取嚴謹的統計分析進行平均數與相關係數的比較，但值得一提的是，光就數值的大小來看，母親版資料中權威性孝道信念與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之間

的相關係數值相對於父親版資料明顯較小。

表二 父親與母親版各主要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兩兩相關係數

	相關係數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1. 對父／母的相互性孝道信念		.20**	.52**	.55**	5.38	0.53
2. 對父／母的權威性孝道信念	.30**		.11**	.20**	3.29	0.86
3. 與父／母的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	.51**	.33**		.67**	2.75	0.81
4. 對父／母的代間照顧角色認同	.60**	.35**	.69**		2.67	0.83
平均數	5.26	3.25	2.50	2.48		
標準差	0.62	0.89	0.89	0.92		

註：** $p < .01$ 。左下角數值為父親版資料 ($N = 488$)；右上角數值為母親版資料 ($N = 518$)

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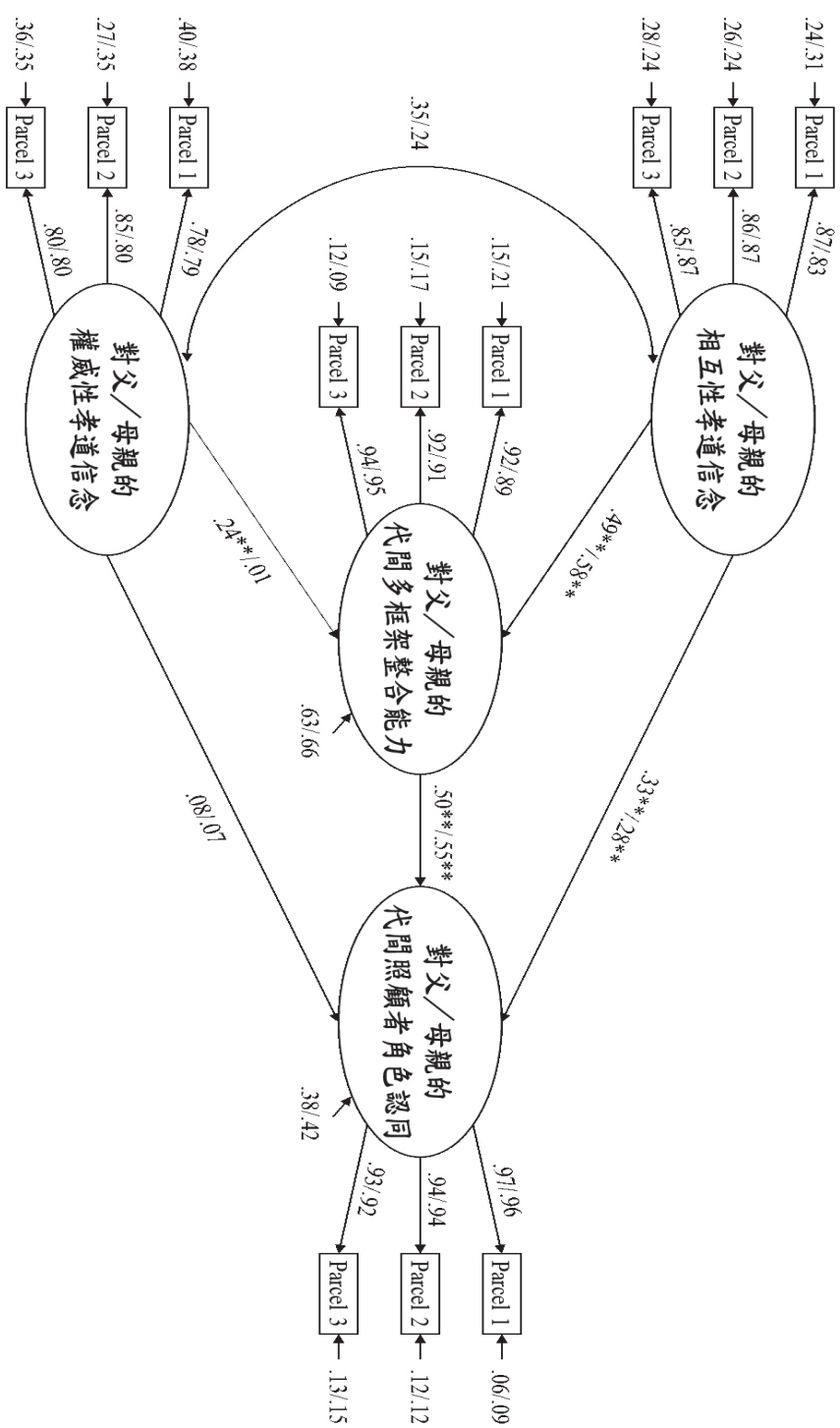
首先針對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對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路徑模型進行分析，結果指出：父親版資料模型的各项指標均符合學者建議的標準 ($\chi^2 = 144.19, df = 78, \chi^2/df = 1.85, CFI = .98, TLI = .97, SRMR = .022, RMSEA = .042$)；母親版資料模型也都符合標準 ($\chi^2 = 201.51, df = 78, \chi^2/df = 2.58, CFI = .97, TLI = .95, SRMR = .024, RMSEA = .055$)，所有觀察指標與潛在構念間的負荷量均達到顯著水準 ($ps < .01$) 並大於 .78。從局部路徑效果顯示：相互性孝道的正向效果在父親版與母親版資料的分析模型中均達顯著水準 (依序： $\gamma_{11} = .57, p < .01$ ； $\gamma_{11} = .59, p < .01$)；權威性孝道的正向效果則只有在父親版模型中達顯著水準 ($\gamma_{12} = .19, p < .01$)，在母親版模型並未達顯著水準。假設1在父親版模型獲得支持，在母親版模型獲得部分支持。卡方差異檢定結果指出，不論在父親版或母親版的資料模型，相互性孝道都有比權威性孝道更具優勢的路徑效果 (父親版： $\Delta \chi^2 = 43.43, \Delta df = 1, p < .01$ ；母親版： $\Delta \chi^2 = 87.26, \Delta df = 1, p < .01$)，假設2獲得支持。

接著，圖一呈現了將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納入的中介模型分析結果，分別以父親版、母親版資料進行模型分析的各项指標均符合標準 (父親版： $\chi^2 = 256.18, df = 120, \chi^2/df = 2.13, CFI = .98, TLI = .96, SRMR = .024, RMSEA = .048$ ；母親版： $\chi^2 = 291.41, df = 120, \chi^2/df = 2.43, CFI = .97, TLI = .95, SRMR = .025, RMSEA = .053$)，所有觀察指

標與潛在構念間的負荷量均達顯著 ($ps < .01$) 且大於 .78。從局部路徑效果指出：相互性孝道對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的路徑在父親版與母親版資料模型皆具顯著正向效果（依序： $\gamma_{11} = .49, p < .01$ ； $\gamma_{11} = .58, p < .01$ ）。然而，權威性孝道對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的路徑只有在父親版模型中具正向顯著效果（ $\gamma_{12} = .23, p < .01$ ），但在母親版模型中並未達顯著水準。假設3在父親版模型獲得支持，在母親版模型獲得部分支持。另外進行卡方差異檢定同樣發現：在父親版與母親版模型中，相互性孝道比權威性孝道更具有優勢性的作用效果（依序： $\Delta \chi^2 = 20.86, \Delta df = 1, p < .01$ ； $\Delta \chi^2 = 89.50, \Delta df = 1, p < .01$ ）。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對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路徑，在父親版（ $\beta_{21} = .51$ ）或是母親版（ $\beta_{21} = .54$ ）均具正向顯著效果（ $ps < .01$ ），假設4獲得支持。至於相互性孝道對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直接路徑，在父親版與母親版也都有顯著的正向效果（依序： $\gamma_{21} = .32, p < .01$ ； $\gamma_{21} = .28, p < .01$ ），但是權威性孝道的直接路徑效果則均未達到顯著水準。

三、間接效果分析結果

經由Mplus軟體分析，本研究以路徑係數乘積取向與自助法取向（5,000次）等分析方法，取得父親版與母親版資料模型中各項中介路徑的間接效果。其中，相互性孝道透過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進而影響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間接效果，不論在父親版或是母親版模型均為正向且顯著（依序： $\text{estimate} = .25, t\text{-value} = 7.43, p < .01, 95\% \text{ CI} = [0.19, 0.32]$ ； $\text{estimate} = .32, t\text{-value} = 9.29, p < .01, 95\% \text{ CI} = [0.26, 0.39]$ ）。相對地，權威性孝道透過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進而影響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間接效果，卻只在父親對象模型達顯著水準（ $\text{estimate} = .12, t\text{-value} = 4.35, p < .01, 95\% \text{ CI} = [0.07, 0.17]$ ），在母親對象模型則未達顯著水準。假設5在父親版模型獲得支持，在母親版模型獲得部分支持。



圖一 父親版與母親版資料進行雙元孝道、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及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中介歷程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

註：親代與子代年齡、子代性別、出生序、手足數、婚姻狀態、兒女數、是否與父母同住，以及親代健康狀況等影響效果皆已控制。斜線前、後的數值分別來自父親版、母親版資料的分析結果。

肆、討論與建議

台灣自1993年開始為老年人口達7%的高齡化社會，並且在2018年已經正式邁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數超過14%（薛承泰，2018）。隨著老年人口數快速增加，保障高齡長者的生活福祉，已是台灣日益重要的社會議題，尤其在重視家庭倫理的台灣社會，成年子女如何覺察、體會、認同敬老愛老的孝道價值觀，並且充分發揮家庭提供照顧與支持的功能，都會是實務工作與家庭生活教育者必須積極思考的議題。為了理解孝道信念如何在華人家庭中發揮提供老年長者照顧與支持的功能，本研究援引孝道雙元模型的理論架構，經由實徵資料進行模型分析，結果指出大多數的假設皆獲得支持。其中，相互性孝道對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影響皆具正向作用效果，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對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正向作用效果，以及前述三項構念間的中介歷程，在父親版與母親版模型中皆獲得支持；至於權威性孝道對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正向作用效果，以及三項構念間的中介歷程，則只有在父親版模型獲得支持，在母親版模型並未獲得支持。

一、代間照顧者角色的認同

本研究關注華人家庭中代間照顧者角色的認同歷程，雖然許多西方學者也主張成年子女在代間照顧關係中的重要性，例如Blenkner（1965）提出的filial maturity概念，或是Chappell等人（Chappell, 2016; Chappell & Funk, 2012）探討的filial responsibility概念，強調個體會在成年後肩負起代間照顧者角色的職責；只是，當部分華人研究者在引述這些概念時（例如：卓馨怡、利翠珊，2008；林茜雯、葉光輝，2018；謝美娥，2000），通常會基於直覺而一廂情願地將它們翻譯為「孝道成熟」與「孝道責任」，卻忽略了孝道倫理在華人家庭中特有的文化底蘊。

華人孝道是一套複雜的概念，從心理學觀點的剖析，它廣泛涉及個體的認知、情感、動機、行為等心理層面（楊國樞，1985；楊國樞等人，1989），並且具有系統性的運作機制（葉光輝，1997）。孝道倫理它不僅是華人子女與父母互動時的重要依循，同時也是父母對子女的殷切期盼（黃曬莉、朱瑞玲，2012；葉光輝，2009a）。已經有實徵資料指出：孝道觀念與華人子女提供老年父母情感、財務，以及勞務等適應資源密切關聯（吳志文、葉光輝，2020；葉光輝，2009b，2016），並顯示它是與老年生活適應緊密關聯的核心概念（利翠珊、張妤玥，2010；陳佳雯等人，2013；魯慧中、鄭保志，2012）。本研究發現：在高度倡導孝道的華人家庭中成長的個體，其

看待親子代間互動的認知框架自然會受到孝道觀念的影響；並且在邁入成年階段後，由於累積了許多與父母相似的生命經驗，因此更加能夠將自己與父母在多重時空場景、各種角色職責之間的互動經驗進行交融比對，藉由彼此間角色觀點的來回取替，逐漸覺察父母過往的辛勞、反思自己過往不成熟的表現，因而可採更圓融的功能性觀點來詮釋過往親子代間相處上的困境，讓成年子女對目前代間關係產生更成熟、更統整的體悟，進而能夠對於代間照顧者角色的接納，強化子女認同自己應當肩負起保障父母老年生活福祉的照顧者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也有學者從哲學的觀點，指出華人子女善盡孝養雙親的照顧者角色職責實則是在體現一種代間存有（*intergenerational being*）的生命價值，經由省思自己承繼著上一世代所付出的愛護與關懷，令過往至今許多與父母互動的各種經驗彼此交織，共同構築出自己在多個世代的鏈結中所具有的存在意義（陳奕傑、許樹珍，2016）。後續的研究方向可以延伸探討華人子女對於代間照顧者角色的認同程度，是否會影響其從代間互動中體驗到的生命價值與意義感受，甚至可以蒐集親代實際老年生活適應表現的實徵資料，對華人孝道觀念與華人親子代間照顧關係做更深入的探究。

二、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以及不同性別的親職角色

透過分析不同性別的親代對象資料，本研究再次驗證了華人孝道概念的複雜性與多元運作原則。其中，相互性孝道著重在親子代間自然且真摯的親密情感，而既有的實徵資料都明確地指出相互性孝道與成年子女在代間照顧關係中的正向表現密切關聯，像是在父母的老年生活中提供更多的情感關懷、金錢資源、家務勞動等照顧資源（葉光輝，2009b）；促進父母對於代間依附關係品質的主觀評估，相信成年子女在自己有需要時能立即回應，並會積極關心且充分理解自己對於老年生活安全的期望（吳志文、葉光輝，2020）；以及能夠回應老年父母對於成年子女願意照顧自己老年生活福祉的期待（呂宜峰，2016；Liu et al., 2011）。在本研究中，不論評估的是自己與父親或母親的代間互動，結果都指出：相互性孝道能夠透過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的促進，進而提升自己對於父母老年生活照顧者角色的認同，而且透過卡方差異檢定，相互性孝道對於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與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正向效果都較權威性孝道的效果具有相對的優勢性。另外，在圖一呈現的模型結果中，相互性孝道對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直接路徑仍有達顯著的正向效果，這顯示：除了透過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的中介外，相互性孝道還可能透過其他心理機制，來提升成年子女對代間照顧者

角色的認同程度。本研究期望未來可以持續探討相互性孝道的運作機制，瞭解還可以透過那些中介變項的機制，令子女在成年後願意接納肩負起保障父母老年生活福祉的照顧者角色。

此外，不同於過往研究指出權威性孝道多與負面的生活適應表現有關（e.g., Leung et al., 2010; Yeh, 2003, 2006），本研究結果顯示：權威性孝道具有透過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進而提升成年子女認同代間照顧者角色的正向影響，而且這項效果主要是在互動對象為父親時發生作用。這項發現符合林茜雯與葉光輝（2018）的研究結果，指出權威性孝道對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正向效果，僅在互動對象為父親的資料中獲得支持。本研究認為，這些一致的發現可能是與父親在家庭中扮演著規範、約束、威嚴等符合權威形象的親職角色有關（Chao & Tseng, 2002; Chuang & Su, 2009）。Chuang 與 Su（2009）強調在傳統華人家庭中，父親肩負著一家之主的角色（p. 332），維持家庭中不同角色間應遵守的分位與秩序，尤其是管教子女的行為表現使其符合社會的規範。因此，如果華人子女愈是遵從華人孝道觀念中的權威性運作原則，愈能夠在成年之後以恪守自己與父親之間尊卑階序結構的代間框架，對過往父親與自己的多元互動經驗進行較佳的功能性統整，並進而提升自己對肩負起保障父親老年生活照顧者角色的認同程度。相對而言，母親與子女的互動上，比父親有較多的慈愛與關懷，向來是親密情感與談心的對象（Shek, 2000）。若子女對母親持有較高的權威性孝道信念，是否意味著子女對母親反而產生敬而遠之距離感，因而削減了促發與增進子女在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的機會，進而導致互動對象為母親時，權威性孝道對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的正向效果皆未達顯著。對於這一可能原因的推論與假設，值得後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除了上述提到可持續深入探究的議題外，本研究還提出以下幾項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供讀者參考。首先，本研究關注在成人代間照顧關係現象中，個體的孝道信念如何提升成年子女認同代間照顧者角色的正向歷程，但在這認同發展歷程中必然也會有造成阻礙、帶來焦慮情緒，或是造成適應威脅的各項因素。本研究缺少探討哪些因素會造成負向影響歷程（即不利於成年子女發展代間照顧者角色的認同），這是未來研究可以拓展涵蓋的重要議題，共同探討其中的正、負向歷程如何相互影響整個代間照顧者角色的認同發展。

其次，本研究所探討的歷程仍可能受到其他背景資料的影響，像是本研究並未蒐集老年父母的婚姻狀態、代間衝突、教育程度、提供子女生活協助的狀況等；這些變項在過往的研究中也被認為可能是決定代間照顧關係品質的影響因素之一（林子鏞、喬芷，2013；林如萍、黃秋華，2017；葉光輝，2009b），後續的研究應在重複驗證時將之納入研究資料蒐集的規劃中，檢驗其對於本研究結果是否會造成調節的影響效果。

第三，本研究主張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的展現，相當於華人成年子女在面對孝親壓力事件時所採取的一種因應策略能力，而結果也確實指出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會影響研究參與者對代間照顧者角色的認同程度。只是本研究並未納入其他重要的指標，像是導致照顧者負荷與照顧者獲益等相關因素，這些都是值得未來進一步探討孝道倫理與代間照顧關係品質之間關連性的重要效標。

第四，本研究為了深入探討孝道信念如何影響成年子女對代間照顧者角色的認同程度，而以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作為其歷程的中介變項，但由於採取的是橫斷式（cross-sectional）研究設計，因此無法確立整個中介歷程的方向性及因果關係。然而，本研究也嘗試分析另外兩種模型：首先以雙元孝道信念，以及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均為前置變項，而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程度為結果變項，在父親版與母親版模型的分析結果顯示：相互性孝道信念（依序： $\gamma_{11} = .32, p < .01$ ； $\gamma_{11} = .28, p < .01$ ）與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的路徑效果均達顯著水準（依序： $\gamma_{13} = .51, p < .01$ ； $\gamma_{13} = .54, p < .01$ ），而權威性孝道信念的路徑效果並未達顯著水準。其次是以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作為前置變項、雙元孝道信念作為中介變項，而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程度為結果變項，在父親版與母親版模型的分析結果顯示：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對相互性孝道信念（依序： $\gamma_{11} = .55, p < .01$ ； $\gamma_{11} = .57, p < .01$ ）與權威性孝道信念的路徑效果均達顯著水準（依序： $\gamma_{21} = .38, p < .01$ ； $\gamma_{21} = .14, p < .01$ ），且相互性孝道信念進而作用在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程度的路徑效果也達顯著水準（依序： $\beta_{31} = .32, p < .01$ ； $\beta_{31} = .28, p < .01$ ），然而權威性孝道信念的路徑效果並未達顯著水準。換言之，相互性孝道信念作為中介變項的間接效果在父親版（estimate = .18, t -value = 6.30, $p < .01$, 95% CI = [0.13, 0.24]）與母親版模型均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16, t -value = 5.46, $p < .01$, 95% CI = [0.10, 0.21]），但權威性孝道信念作為中介變項的間接效果在兩個版本模型中都未達顯著水準。只是這兩組額外分析的模型都與本研究原本探討的中介歷程模型同屬等價模型（equivalent model），亦即這些模型的多項適配度指標均相同，因此難以從現有統計分析的結果來判斷這些變項之間的路徑方向何者更為適配。建議後續研究可以

採取多個時間點的縱貫式 (longitudinal) 追蹤調查設計，透過交叉延宕 (cross-lagged) 的分析便可以進行這些主要變項間運作歷程模型的檢驗，甚至有可能發現這些變項之間具有相互決定的雙向影響歷程。

第五，本研究部分研究參與者均完整填寫父親版與母親版的問卷，而將這些重疊樣本進行相關係數分析後發現相互性孝道信念、權威性孝道信念、代間多框架整合能力、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這四個主要變項在其父親版分數與母親版分數之間皆具有中高度的正相關 (依序： $r = .46$ ， $r = .47$ ， $r = .40$ ， $r = .44$ ； $ps < .01$)，這顯示出：本研究針對父親版與母親版資料進行分析得到的結果有可能受到這些重疊樣本的偏誤影響，而使得父親版與母親版分析的部分結果較為相近。為了深入探討這項限制，本研究也依據父親版與母親版資料之間的交集與否，細分出無交集樣本與交集樣本，結果發現不論是在父親版或母親版的分析模型，無交集樣本與交集樣本得到的結果皆與整體樣本得到的結果相近，顯示重疊樣本造成偏誤的影響並未大到改變原本的分析結果。不過，本研究仍建議後續研究可以透過更嚴謹的取樣程序，以更具代表性的資料重複檢證本研究結果的可靠性。

第六，本研究參與者中，子女評估父母健康狀態良好者父親版與母親版各佔74%與73%，照顧高功能的父母親與照顧健康狀態不佳的父母所承受的負擔相當不同，因此未來在應用與推論上都宜注意謹慎，有賴後續進一步檢證。

第七，過往研究曾指出已婚女性肩負著多重的家庭照顧者角色，其照顧的對象不僅涉及了原生父母還有公公與婆婆 (王秀紅，1994)，而目前也很少有實徵研究援引孝道雙元模型探討相互性與權威性兩種孝道信念如何影響已婚女性對於照顧原生父母、公婆之多重家庭照顧者角色的認同歷程，以及代間框架整合能力是否仍能發揮中介的影響，這些富有華人家庭文化特色的現象都值得後續研究做更進一步的釐清。

最後，同樣受到橫斷式研究設計的影響，再加上本研究所有主要變項都採用自陳式量表進行評估，研究結果可能會受到共同方法變異偏誤 (common method variance bias) 而有高估的疑慮；未來研究可以考慮在蒐集各項研究變項時採取較長的時間間隔，來減少這項方法偏誤造成的影響。然而，縱使有這些值得持續探討的研究限制，相信本研究這些發現仍然能夠提供給實務工作者與家庭生活教育推廣單位，作為提倡華人孝道倫理的正向功能，並且藉以保障台灣長者老年生活福祉的參考。

參考文獻

- 王秀紅（1994）：照顧者角色對婦女衝擊：護理的含意。《護理雜誌》，**41**（3），18-23。[Wang, H. H. (1994). The impact of caregiving role on women: Nursing implications. *The Journal of Nursing*, *41*(3), 18-23. doi: 10.6224/JN.41.3.18]
- 利翠珊（2002）：婆媳與母女：不同世代女性家庭經驗的觀點差異。《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3**，179-218。[Li, T. S. (2002). Mother/daughter and mother/daughter-in-law: Women's perception differences in two generations.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13*, 179-218. doi: 10.6255/JWGS.2002.13.179]
- 利翠珊、張妤玥（2010）：代間照顧關係：台灣都會地區成年子女的質性訪談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3**（1），99-124。[Li, T. S., & Chang, Y. Y. (2010). The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relationship: A qualitative inquiry of adult children's experience in urban Taiwan.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3*(1), 99-124. doi: 10.30074/FJMH.201003_23(1).0004]
- 吳志文、葉光輝（2020）：代間依附關係與其對老年生活適應的效果：以成年子女孝道信念與關係自主性作為前置因素。《中華心理學刊》，**62**（1），1-30。[Wu, C. W., & Yeh, K. H. (2020). Intergenerational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and its effect on elderly life adaptation: Adult children's filial belief and relating autonomy as antecedents.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62*(1), 1-30. doi:10.6129/CJP.202003_62(1).0001]
- 呂宜峰（2016）：老年父母的孝道期待、落差與憂鬱反應。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Lu, Yi-Feng (2016). *Elderly parents' filial expectation, expectation gap and depressive reaction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卓馨怡、利翠珊（2008）：成年子女的孝道責任與焦慮：親子關係滿意度的影響。《本土心理學研究》，**30**，155-197。[Chuo, H. Y., & Li, T. S. (2008). Filial obligation and anxiety of adult children: The effect of satisfaction with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30*, 155-197. doi: 10.6254/2008.30.155]
- 林子鏞、喬芷（2013）：父母需要子女的關心：探討台灣中老年人的代間關係與主觀經濟壓力之相關性研究。《台灣公共衛生雜誌》，**32**（6），599-612。[Lin, T. Y., & Chiao, C. (2013). Parents who need children's care: Explor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subjective economic strain among older adults in Taiwan. *Taiw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32*(6), 599-612. doi: 10.6288/TJPH201332102051]
- 林如萍、黃秋華（2017）：三代之間：代間關係與中年生活福祉。《人文及社會科學集

- 刊，**29**（3），381-414。[Lin, J. P., & Huang, C. H. (2017). Between adult children and aging parent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well-being in midlif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9*(3), 381-414.]
- 林青蓉、王碧華、楊翠雲、黃君瑜（2013）：癌症病患之子女的生活衝擊與適應。台灣醫學雜誌，**17**（2），171-179。[Lin, C. R., Wang, B. H., Yang, T. Y., & Huang, C. Y. (2013). Life impact and adaptation for children when a parent suffering from cancer. *Formosan Journal of Medicine*, *17*(2), 171-179. doi: 10.6320/FJM.2013.17(2).10]
- 林茜雯、葉光輝（2018，9月）：成年子女孝道觀念及焦慮對照顧老年父母角色反轉傾向之影響。「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家人關係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台北。[Lin, C. W., & Yeh, K. H. (2018, September). *The filial belief and filial anxiety on adult children's tendency of role reversal when taking care of aging pare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cademic conference of family relationship, Taipei.]
- 高子淳、葉光輝、何文澤（2019）：多重時空框架經驗整合能力對成人親子關係的效果。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54**，91-122。[Kao, T. C., Yeh, K. H., & Ho, W. C. (2019). The effect of capacity of integrating cross-time-and-space experience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adult children and aging parents.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54*, 91-122. doi: 10.3966/172851862019010054004]
- 陳佳雯、張妤玥、高旭繁、陸洛（2013）：老了，就不中用了？台灣高齡者最適老化之歷程探究。本土心理學研究，**40**，87-140。[Chen, J. W., Chang, Y. Y., Kao, S. F., & Luo, L. (2013). Getting old is terrible? The optimal aging process among older Taiwanese.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40*, 87-140. doi: 10.6254/2013.40.87]
- 陳奕傑、許樹珍（2016）：孝與代間關照關係轉換的現象學。應用倫理評論，**61**，21-35。[Chen, Y. J., & Sheu, S. J. (2016).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 transformation between filial pie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Applied Ethics Review*, *61*, 21-35.]
- 陸洛、陳欣宏（2002）：台灣變遷對中老人的家庭角色調適及代間關係之初探。應用心理研究，**14**，221-249。[Luo, L., & Chen, H. H. (2002).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role adjustment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elderly in the changing Taiwan.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14*, 221-249.]
- 勞悅強（2004）：「孝經」中似有還無的女性一兼論唐以前孝女罕見的現象。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4**，293-330。[Lo, Y. K. (2004). On the dearth of filial daughters in pre-Tang Chin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24*, 293-330. doi: 10.6351/BICLP.200403.0293]

- 費孝通（2006）：中國家庭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Fei, X. T. (2006). *Research in China family*. Shanghai,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 黃光國（2009）：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臺北：心理。[Huang, K. K. (2009). *Confucian relationshipism: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Taipei, Taiwan: Psychological Publishing.]
- 黃志忠（2013）：老人主要照顧者施虐傾向及其危險因子之研究—以中部地區居家服務老人為例。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6**（1），95-139。[Huang, C. C. (2013). Potentially harmful caregiver behavior: A case study of in-home care of elderly from central Taiwan.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6(1), 95-139.]
- 黃曬莉、朱瑞玲（2012）：是亂流？還是潮起、潮落？—尋找臺灣的「核心價值」及其變遷。高雄行為科學學刊，**3**，61-94。[Huang, L. L., & Chu, R. L. (2012). Is it a wind shear or a tide getting up-and-down? Searching for core values and their trends in Taiwan. *The Journal of Kaohsiung Behavioral Sciences*, 3, 61-94. doi: 10.29854/TJKBS.201205.0003]
- 楊國樞（1985）：現代社會的新孝道。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1），51-67。[Yang, K. S. (1985). New filial piety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ies. *Renaissance of Chinese Culture Monthly*, 19(1), 51-67.]
- 楊國樞、葉光輝、黃曬莉（1989）：孝道的社會態度與行為：理論與測量。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5**，171-227。[Yang, K. S., Yeh, K. H., & Huang, L. L. (1989). A social attitudinal analysis of Chinese filial piety: Conceptualization and assessment.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65, 171-227.]
- 葉光輝（1997）：台灣民眾之孝道觀念的變遷。載於張荳雲、呂玉瑕、王甫昌（主編），九〇年代的台灣社會：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究系列二（下）（171-214頁）。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Yeh, K. H. (1997). Changes in the Taiwanese people's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In L. Y. Cheng, Y. H. Lu, & F. C. Wang (Eds.), *Taiwanese society in 1990s: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symposium II (part 2)* (pp. 171-214).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 葉光輝（2005）：孝道的心理與行為。載於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主編），華人本土心理學（293-329頁）。臺北：遠流出版社。[Yeh, K. H. (2005). Chinese filial piety: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and behaviors. In K. S. Yang, K. K. Huang, & C. F. Yang (Eds.), *Chinese indigenous psychology* (pp. 293-329). Taipei, Taiwan: Yuan-Liou.]
- 葉光輝（2009a）：再論華人孝道雙元模型的幾個關鍵性議題。本土心理學研究，**32**，207-248。[Yeh, K. H. (2009a). Revisiting some key issues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32, 207-248. doi:

- 10.6254/2009.32.207]
- 葉光輝 (2009b)：台灣民眾的代間交換行為：孝道觀點的探討。本土心理學研究，**31**，97-141。[Yeh, K. H. (2009b).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behaviors in Taiwan: The filial piety perspective.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31*, 97-141. doi: 10.6254/2009.31.97]
- 葉光輝 (2016)：成人親子衝突歷程中情感與關係的正向轉化：針對年老父母照顧安排脈絡下的探討。科技部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編號：MOST103-2410-H001-059-SS3)。[Yeh, K. H. (2016). Positive transformation in affection and relationship under the conflictive processes of adult child with their elderly parent on caring arrangement,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103-2410-H001-059-SS3). Taipei, Taiwan: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葉光輝、曹惟純 (2014)：從華人文化脈絡反思台灣高齡社會下的老人福祉。中國農業大學學報，**31** (3)，30-46。[Yeh, K. H., & Tsao, W. C. (2014). A contextualized reflection on the elderly well-being in Taiwan: From the Chinese cultur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1*(3), 30-46.]
- 蔡佳容、蔡榮順、李佩怡 (2016)：失智症家庭照顧者之受苦與因應經驗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47**，59-90。[Tsai, C. J., Tsai, J. S., & Li, P. Y. (2016). Suffering and coping experiences amongst family caregivers of dementia patients. *Chines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47*, 59-90. doi: 10.3966/172851862016120047004]
- 衛生福利部 (2014)：中華民國 **102**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取自 <https://www.mohw.gov.tw/dl-4707-e91899c0-d62d-49d9-9dbe-4a2def8e516c.html>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14). *Report of the Senior Citizen Condition Survey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ohw.gov.tw/dl-4707-e91899c0-d62d-49d9-9dbe-4a2def8e516c.html>]
- 鄭欸 (2004)：大學生對親代安養態度與自我老年安養期待之差異。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Cheng, K. (2004).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 toward care of aged -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arents and future selve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nhua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
- 魯慧中、鄭保志 (2012)：孝道的認同與實踐—以「成年兒子與父母同住決策」為分析對象。人口學刊，**45**，111-156。[Lu, H. C., & Cheng, P. C. (2012). Ident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ilial norms: Adult sons' decision to live with elderly parents.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45*, 111-156. doi: 10.6191/jps.2012.12]
- 薛承泰 (2018)：台灣正式進入高齡社會了！。取自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1/3037349>[Hsueh, C. T. (2018). *Taiwan officially turned into the aged society!* Retrieved from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1/3037349>]

- 謝美娥 (2000) : 成年子女照顧者 : 經驗之初探。政治大學社會學報, 30, 43-80。
[Hsieh, M. O. (2000). Adult children caregivers: The exploration of their experiences. *The NCCU Journal of Sociology*, 30, 43-80.]
- 謝美娥 (2002) : 失能老人與成年子女照顧者對失能老人遷居歷程與解釋 : 家庭到機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6 (2), 7-64。[Hsieh, M. O. (2000). The decision of change in living arrangements about disabled older adults: From home-dwelling to institution-dwelling.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6(2), 7-64.]
- Bentler, P. M. (1990). Comparative fit indexes in structural model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7, 238-246. doi: 10.1037/0033-2909.107.2.238
- Blenkner, M. (1965). Social work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in later life with some thoughts on filial maturity. In E. Shanas, & G. F. Streib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family: Generational relations* (pp. 117-130).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Burr, W. (1982). Families under stress. In H. I. McCubbin, A. E. Cauble, & J. M. Patterson (Eds.), *Family stress,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pp. 5-25).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 Byrne, B. M. (2010).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AMOS: Basic concepts, applications, and programming* (2nd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Academic.
- Carstensen, L. L. (1992). Social and emotional patterns in adulthood: Support for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Psychology and Aging*, 7, 331-338. doi: 10.1037//0882-7974.7.3.331
- Carstensen, L. L., Fung, H. H., & Charles, S. T. (2003).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and the regulation of emo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life. *Motivation and Emotion*, 27(2), 103-123. doi: 10.1023/A:1024569803230
- Cervone, D. (2004). The architecture of person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111(1), 183-204. doi: 10.1037/0033-295X.111.1.183
- Chao, R., & Tseng, V. (2002). Parenting of Asians. In M. H. Bornstein (Ed.), *Handbook of parenting: Social conditions and applied parenting* (pp. 59-93).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Chappell, N. L. (2016). Filial responsibility. In S. Krauss Whitbourne (Ed.). *The encyclopedia of adulthood and aging* (pp. 502-506).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 Chappell, N. L., & Funk, L. (2012). Filial responsibility: Does it matter for caregiving behaviours? *Ageing and Society*, 32(7), 1128-1146. doi: 10.1017/S0144686X11000821
- Chen, W. W.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 filial pie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8(3), 308-314. doi: 10.1037/

a0036819

- Chen, W. W., & Ho, H. Z. (2012).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roles of Taiwanese students' academic beliefs and filial pie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7*(4), 315-324. doi: 10.1080/00207594.2011.630004
- Chen, W. W., & Wong, Y. L. (2013). What my parents make me believe in learning: The role of filial piety in Hong Kong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9*(4), 249-256. doi: 10.1002/ijop.12014
- Chen, W. W., & Wu, C. W. (2017). Transmission of ideas about love: Filial piety, love attitudes, and romantic satisfacti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4*, 440-452. doi: 10.1111/per.12191
- Chen, W. W., Wu, C. W., & Yeh, K. H. (2016). How parenting and filial piety influence happines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quality of family life in Taiwanese adult children.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22*(1), 80-96. doi: 10.1080/13229400.2015.1027154
- Chen, W. W., Yan, J. J., & Chen, C. C. (2018). Lesson of emotions in the family: The rol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filial pie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1*(1-2), 74-82. doi: 10.1111/ajsp.12207
- Chuang, S. S., & Su, Y. (2009). Do we see eye to eye? Chinese mothers' and fathers' parenting beliefs and values for toddlers in Canada and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3*, 331-341. doi: 10.1037/a0016015
- Cohen, S., & Janicki-Deverts, D. (2009). Can we improve our physical health by altering our social network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 375-378. doi: 10.1111/j.1745-6924.2009.01141.x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 D. Y. F. (1994). Filial piety, authoritarian moralism, and cognitive conservat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0*, 349-365.
- Ho, D. Y. F. (1996). Filial piety and its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In M. H. Bond (Ed.),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psychology* (pp. 155-165). Hong Kong,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u, L., & Bentler, P. 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6*(1), 1-55.

- doi: 10.1080/10705519909540118
- Jen, C. H., Chen, W. W., & Wu, C. W. (2019). Flexible mindset in the family: Filial piety,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general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6*(6), 1715-1730. doi: 10.1177/0265407518770912
- Kim, K. C., Kim, S., & Hurh, W. M. (1991). Filial pie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in Korean immigrant familie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33*(3), 233-245. doi: 10.2190/Y91P-UNGR-X5E1-175K
- Kline, R. B. (2016).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4th ed.).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LaFave, D. (2016). Family support and elderly well-being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Ageing International, 42*(2), 142-158. doi: 10.1007/s12126-016-9268-0
- Leung, A. N., Wong, S. S., Wong, I. W., & McBride-Chang, C. (2010). Filial piety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in Hong Kong Chinese early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30*(5), 651-667. doi: 10.1177/0272431609341046
- Lin, J. P., & Yi, C. C. (2011). Filial nor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o aging parents in China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0*, S109–S120. doi: 10.1111/j.1468-2397.2011.00824.x
- Liu, B. S., Li, C. Y., Yeh, K. H., & Huang, H. C. (2011). Differences in filial behavior in multi-generation families that live together.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19*(1), 25-34. doi: 10.1097/JNR.0b013e31820b0f3c
- Little, T. D., Cunningham, W. A., Shahar, G., & Widaman, K. F. (2002). To parcel or not to parcel: Exploring the question, weighing the merit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9*(2), 151-173. doi: 10.1207/S15328007SEM0902_1
- Lu, N., Lou, V. W. Q., Zuo, D., & Chi, I. (2016).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self-rated health trajectories among older adults in rural China. *Research on Aging, 39*(2), 322-344. doi: 10.1177/0164027515611183
- McCubbin, H. I., & Patterson, J. M. (1982). Family adaptation to crises. In H. I. McCubbin, A. E. Cauble, & J. M. Patterson (Eds.), *Family stress,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pp. 26-47).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 Mischel, W., & Shoda, Y. (1995). A cognitive-affective system theory of personality: Reconceptualizing situations, dispositions, dynamics, and invariance in personality structure.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2), 246-268. doi: 10.1037/0033-295X.102.2.246
- Mischel, W., & Shoda, Y. (2008). Toward a unified theory of personality: Integrating

- dispositions and processing dynamics within the cognitive-affective processing system. In O. P. John, R. W. Robins, & L. A. Pervin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pp. 208-241).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Peng, C., Kwok, C. L., Law, Y. W., Yip, P. S. F., & Cheng, Q. (2019).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satisfaction with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elderly parents' life satisfaction in Hong Kong. *Aging and Mental Health, 23*(4), 428-438. doi: 10.1080/13607863.2017.1423035
- Shek, D. (2000). Differences between fathers and mothers in the treatment of,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teenage children: Perception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35*, 135-146.
- Smith, C. S., & Hung, L. C. (2012). The influence of eastern philosophy on elder care by Chinese Americans. *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Nursing, 23*(1), 100-105. doi: 10.1177/1043659611423827
- Yeh, K. H. (2003). The beneficial and harmful effects of filial piety: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In K. S. Yang, K. K. Hwang, P. B. Pedersen, & I. Daibo (Eds.), *Progress in Asian social psychology: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pp. 67-82). London, England: Westport, Connecticut.
- Yeh, K. H. (2006). The impact of filial piety on the problem behaviours of culturally Chines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Psychology in Chinese Societies, 7*, 237-257.
- Yeh, K. H. (2014). Filial piety and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in the Taiwanese Family. In D. L. Poston, Jr., W. S. Yang, & D. N. Farris (Eds.), *The family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ese societies* (pp. 29-38). New York, NY: Springer Netherlands.
- Yeh, K. H., & Bedford, O. (2003). A test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 215-228. doi: 10.1046/j.1467-839X.2003.00122.x
- Yeh, K. H., & Bedford, O. (2004). Filial belief and parent-child confli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9*(2), 132-144. doi: 10.1080/00207590344000312
- Yeh, K. H., Tsao, W. C., & Chen, W. W. (2010). Parent-child conflict and psychological maladjustment: A mediational analysis with reciprocal filial belief and perceived threa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 131-139. doi: 10.1080/00207590903085505
- Yu, H., Wu, L., Chen, S., Wu, Q., Yang, Y., & Edwards, H. (2016). Caregiving burden and gain among adult-child caregivers caring for parents with dementia in China: The partial mediating role of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 28*(11), 1845-1855. doi: 10.1017/S1041610216000685

收件日期：108年02月14日

一審日期：108年07月23日

二審日期：108年10月24日

通過日期：109年02月26日

Being a Caregiver for Aging Parents: Adult Children's Filial Belief, Capacity of Integrating Intergenerational Cross-time-and-space Experience, and Their Role Identification of Caregiver

Chih-Wen Wu

Kuang-Hui Ye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cademia Sinica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play a central role in shaping elderly well-being, especially for Chinese family, in which filial piety is a primary virtue to urge adult children to fulfill their role obligation as a caregiver of their aging parents. This study adopts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 and investigates the different impacts of reciprocal and 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on adult children's role identific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er (RIIC). It is assumed that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RFP) has a more positive influence than 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AFP) because the former originates from authentic emotional bonding and facilitates stronger motivation to care about their parents, while the latter is affected by the intern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al norms that emphasize children's obedience and submission to their parents. This study further examines the possible mediator, namely Integrating Cross-time-and-space Experience (ICTSE), of the abovementio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filial piety and RIIC. ICTSE represents a capacity of perspective taking and open thinking which make adult children be able to better review, integrate, and refine their early parent-children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by multiple frames about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different roles' perspectives. ICTSE facilitates adult children's self-acceptance in their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their role reversal and identification as a caregiver. This study recruited 724 participants who were above 35 years old. Thes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father or/and mother version questionnaire if their father or/and mother was alive and above 60 years old. A total of 488 data were valid for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father (324 of them were from female participants; average age: 43.03 years old, SD = 6.48 years; average age of their father: 73.15 years old, SD = 8.36 years). In addition, a total of 518 data were valid for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mother (332 of them were from female participants; average age: 45.76 years old, SD = 7.95 years; average age of their father: 72.25 years old, SD = 8.99 years). This study used

* Corresponding author: Kuang-Hui Yeh, email: ykh01@gate.sinica.edu.tw
doi: 10.3966/172851862020090059001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to analyze two hypothetical models. The first model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RFP and AFP on RIIC and showed acceptable model fit for both father- and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RFP was significant on RIIC for both father-child and mother-child dyads, while that of AFP was significant for only father-child dyad. It also indicated the effect of RFP was more superior to that of AFP for both father and mother targets. The second model further test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CSTE and also found acceptable model fit for both father-child and mother-child dyad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RFP was significant on ICSTE for both father-child and mother-child dyads, while that of AFP was significant for only father-child dyad. The effect of RFP was more superior to AFP for both father-child and mother-child dyads. ICTSE had a positive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RIIC for both father-child and mother-child dyad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CTSE in the path from RFP to RIIC was significant for both father-child and mother-child dyads, whereas that in the path from AFP to RIIC was significant for only father-child dyad.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at filial piety in Chinese society could promote family to bring its functions of supporting and caring for aging parents into fully play. The findings might be important in providing professional consultants and family life educator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filial belief urges Chinese adult to identify their role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er and care about their elderly parents' well-being more sincerely.

Keywords: 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capacity of integrating intergenerational cross-time-and-space experienter,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role identific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er.